

2010 年先秦史研究概览

苏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0 年先秦史研究有许多亮点,显示出学界在开拓新史料、探索新问题方面动力十足。全年共举办多项学术活动,出版相关著作 70 余部,发表论文 600 多篇。下面择要介绍。

会议、专著

会议。4 月 17—19 日(北京)“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4 月 24—26 日(甘肃庆阳)2010 年早期秦文化学术研讨会;5 月 6 日(湖北十堰)《诗经》尹吉甫文化研讨会;5 月 15—16 日(北京师范大学)“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6 月 13—15 日(重庆)“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7 月 17 日(中国人民大学)“经学:知识与价值”学术会议;9 月 6—7 日(北京大学)“老子:文献与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0 月 22—23 日(北京)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 18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11 月 13 日(四川温江)鱼凫文化高端论坛;12 月 6—8 日(武汉大学)“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 2010”;12 月 11—12 日(河南郑州)中原地区古城、古都与古国学术研讨会。

专著。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有:黄天树《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张振林主编《商周金文摹释总集》(中华书局),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徐在国编《楚帛书诂林》(安徽大学出版社),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专题的研究可举出: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秦小丽《中国古代装饰品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俞为洁《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史前人文植物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宇信、魏建震《甲骨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婷珠《殷商甲骨文字形系统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邵英《古文字形体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科学出版社),胡进驻《殷墟晚商墓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三联书店),张闻玉等《西周纪年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曹建墩《先秦礼制探赜》(天津人民出版社),王连龙《〈逸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雪萍《〈周礼〉饮食制度研究》(广陵书社),王泽强《简帛文献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刘冬颖《出土文献与先秦儒家〈诗〉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高方《〈左传〉女性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

华书局),吕学明《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科学出版社),邵晓洁《楚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朱萍《楚文化的西渐》(巴蜀书社),田炜《古玺探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方面,宋镇豪主编《商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7册,分别是王震中《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王宇信、徐义华《商代社会与国家》,王震中《商代都邑》,杨升南、马季凡《商代经济与科技》,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李玉洁主编《黄河文明丛书》(科学出版社)收入张新斌《黄河流域史前聚落与城址研究》、王蕴智《殷商甲骨文研究》、李玉洁《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等。陈伟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陈伟《新出楚简研读》、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萧毅《楚简文字研究》、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

学者的论文结集有:金景芳《金景芳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罗福颐《古玺印考略》(紫禁城出版社)、张政烺《张政烺论易丛稿》(中华书局)、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姚孝遂《姚孝遂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许进雄《许进雄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萧楠《甲骨学论文集》(中华书局)、林向《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科学出版社)、张以仁《张以仁先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3辑(科学出版社)、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文物出版社)、晏昌贵《简帛数学与历史地理论集》(商务印书馆)、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中华书局)、臧克和《简帛与学术 中西学者视野中的出土文献与文化资源》(大象出版社)、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此外,陈槃《洵庄文录》、《旧学旧史说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大陆重印。

史前文明

社会形态。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评定标准问题》(《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第一辑,科学出版社;下文简称《聚落考古》)指出,运用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这四要素来衡量文明形成时需要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并就如何依据聚落形态演变来探讨文明形成作了阐述。辛怡华《东灰山、三星村、平洋等墓地与新石器时代几处墓地人口平均寿命比较》(《华夏考古》4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约为19.99岁。墓地年代愈晚,其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值有延长的趋势。在大约3000年的历史进程中,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了2.66岁。无论新石器时代居民,还是历史时期的居民,普遍是男性人口平均寿命高于女性。在同一时期,黄河流域先民的人口平均寿命可能高于长江流域先民。薛新明、杨林中《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反映的社会变革》(《聚落考古》)通过考察遗址各期墓地的随葬品及墓主形态,分析了其中呈现的社会分化、礼仪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等问题。陈靓、薛新明《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人口构成研究》(《西北大学学报》6期)指出,当时死亡人口集中于中年期,女性青年期的死亡率

明显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她们负担生育功能有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阶段,男、女性别比变化很大,或许与死者的身份、职业密切相关。何国俊《两翼—中轴: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空间格局的演变》(《东南文化》6期)考察了新石器时代各阶段岭北外来文化进入之后给岭南古文化格局带来的相应变化,认为土著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叶万松《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经济的比较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两地史前经济的发展水平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吴传仁等《从孝感叶家庙遗址浮选结果谈江汉平原史前农业》(《南方文物》4期)推断叶家庙遗址的居民对于稻田杂草的治理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并对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作了探讨。

此外,可参杨育彬《河南裴李岗文化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论裴李岗文化——纪念裴李岗文化发现3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科学出版社)、栾丰实《试论裴李岗文化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关系及其发展去向》(《论裴李岗文化》)、袁建平《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以湖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中原文物》5期)、靳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3期)、闫亚林《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文化格局的变迁与筒形罐系统的文化趋势》(《中原文物》3期)、韩建业《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6期)、陈洪波《试论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类型和演变》(《广西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

聚落环境。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1期)指出,环境容量可以视作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能力,从采集、渔猎到农业,各类生存方式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依次降低,环境容量反而提高,兴隆洼至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持续使用时间逐渐延长就是这一人地关系互动影响的结果。邱国斌《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期)探讨了新石器时代当地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刘辉《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城址聚落的新发现与新思考》(《聚落考古》)认为,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的普遍兴起,是聚落形态演变在气候环境的促进和压力下,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社会组织趋于复杂化的结果。其聚落等级分明显示出这一早期国家形态的文化主体可对应文献中的三苗集团。魏兴涛《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废原因探讨》(《华夏考古》1期)认为,当时氏族集团的冲突与侵袭是中原龙山城址兴废的社会背景。相关研究还有管小平《论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级差》(《四川文物》4期)。

宗教艺术。晁福林《从“数术”到“学术”——上古精神文明演进的一个线索》(《古代文明》4期)认为,当时充满谬误与迷信的数术的发展反映了先民对自然与人自身的探索,也是社会前进的一个推动力量。由数术到学术的嬗变,反映了上古精神文明演进的复杂性。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文物》3期)指出,晋南地区有一部分玉器来源于海岱地区,东方因素的传播路线可能有南、北两线。从一些共有文化因素来分析,晋南地区在陕北地区与海岱地区的交流中起到了联系纽带的作用。王芬《海岱和太湖地区宗教信仰与礼制的比较分析》(《江汉考古》1期)分别讨论了海岱地区和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宗教信仰和礼制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认为前者与中原地区类似,可称为注重祖先崇拜的世俗型社会,后者则凸显敬畏神祇的宗教特征。方向明《崧泽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南文化》6期)从形制、工艺和内涵等角度讨论了崧泽文化玉器的特点,并对“崧泽晚期——良渚早期”玉器的地位与

意义作了阐述。费玲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玉耳珰初探》(《东南文化》2期)认为,玉耳珰的产生、发展和演进有着自身的轨迹,其功能经历了从单一的装饰物逐渐转化为身份和地位象征的过程。郭大顺《牛河梁遗址所见东北南部早期聚落演变与文明进程——编写〈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体会之三》(《聚落考古》)认为,牛河梁遗址的社会分层出现“一人为中心”的等级分化,拥有“祖庙”的最高层次中心聚落对整个文化共同体起维系和制约的作用。同生活、生产类型的相关遗址对比,宗教祭祀性凸显的牛河梁遗址在反映聚落演变到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方面要更敏感一些。贺刚《湖南高庙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白陶》(《东南考古研究》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认为,高庙白陶不是实用器,而是与神灵信仰和祭祀活动相关的祭器,高庙白陶的对外传播,不仅体现在实物和技术,更表现为精神领域的观念和信仰的传递。

此外,还有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考古》4期)、彭永生《试论黄河流域史前时代的陶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3期)、冯时《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4期)、邓淑苹《良渚晚末期玉器变化及纹饰流传初探》(《东南考古研究》第4辑)、郭静云《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殷都学刊》3期)等。

夏商史

夏商史事制度。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1期)认为,夏王朝是由王邦与属邦以及其他层面政治实体共同构成的“复合型国家结构”。冯时《二里头文化“常旛”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第17集,科学出版社)认为,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龙形器为大常之龙旛,用于覆尸,正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此墓主人为偃氏族长,在王朝任祀祷河神之巫,常旛系所用的明旛,故本身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彭邦本《〈容成氏〉、陶寺遗址与禹启之际古史传说琐议》(《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巴蜀书社;下文简称《徐集》)认为,陶寺遗址中、晚期之交所显示的暴力现象,应是夏朝初年启、益两方力量武装冲突的结果。蔡全法《“黄台”、“黄水”与“启都”新论》、郑杰祥《新砦遗址和夏代“启室”》(均载《聚落考古》)就新砦遗址与典籍的对应问题分别作了探讨。罗琨《〈保训〉“追中于河”解》(《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认为,“追”即追随、继承之义,指河有功于商,故要效法河的公正以报之。楼劲《汤祷传说的文本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六集,商务印书馆)认为,先秦以来汤祷传说的各种文本流传,可分为儒、墨两大系统,揭示出其中分化与演变的脉络,可以为据传说治古史者提供解析的个案样本,史料片段的真实久远与衍生史事的价值不可简单划等号。陈星灿等《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通过对东下冯盐仓的考察与确定,认为至迟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河东盐池的盐业生产和分配已经由国家介入了,食盐官营是中国早期国家实行的政治策略之一,有助于早期国家的集权与扩张。

罗琨《商代寝官初探》(《徐集》)认为,商代作为王之近臣的寝官,其主要职责并非一般的管理宫寝之事,除了传达和执行王令,还可拥有兵权,社会地位远高于小臣。寝官往往以“亞”或“亞某”为氏,显示出他们的家族传统备受重视。沈长云《周族起源诸说辨正》(《徐集》)剖析并反驳了周族起源的“晋南”说和“关中土著”说,认为周族是从晋陕交界一带李家崖文化分

布的地区迁到关中去的。代生《〈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云梦学刊》2期)结合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吕望为臧”,认为《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相关研究还有张国硕《“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中原文物》3期)、徐昭峰《试论社会有序性的需求是夏国家建立的根本原因》(《四川文物》4期)、张翠莲《论商族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徐集》)、杨鸿勋《古蜀大社(明堂·昆仑)考——金沙郊祀遗址的九柱遗迹复原研究》(《文物》12期)、沈建华《清华战国楚简〈保训〉所见商代先祖史迹传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王建军《殷周时期的“举族”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期)、连劭名《商代的市與次》(《殷都学刊》2期)、常玉芝《商代日神(东、西方神,东、西母)崇拜》(《晋阳学刊》6期)、郭旭东《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中国史研究》2期)、刘源《从殷墟卜辞的“族”说到周初金文中的“三族”》(《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雒有仓《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殷都学刊》2期)、段渝《古史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巴蜀文化研究的启示》(《徐集》)。

甲骨学。裘锡圭《释“𠄎”》(《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认为,卜辞中此字指祭祀前对祭祀场所的洒扫羹陈,性质与《周礼》“祭祀修寝”之“修”同。刘桓《殷墟卜辞中的“多毓”问题》(《考古》10期)认为“毓”读为“冑”,表示血统渊源所自,卜辞中凡“毓祖”后缀日名者,皆应是商直系先王。常耀华《卜辞的“省田”与“观猎”》(《殷都学刊》4期)指出,“省田”与农事无关,而常与“狩”、“擒”等对举,应即观猎。姚萱《花东甲骨“多丰臣”与相关问题》(《史林》6期)认为,“多丰臣”即“多介臣”,介训副、次,“介臣”为地位较低、处于副次地位的臣。赵鹏《从花东子组卜辞中的人名看其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六集)指出,花东子组卜辞主要存在于武丁晚期,上限可早到武丁中期偏晚,历时一二十年间。刘风华《〈小屯南地甲骨〉2667版新探》(《出土文献》第一辑)认为该版属于习刻而非历草类,但所刻内容可信。历草类卜辞时代可能较早,起自武丁晚期而多属祖庚早中期。此外,她还有《〈小屯南地甲骨〉2667版与历草类》(《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一文。胡辉平《殷卜辞中“大示”问题再研究》(《考古》3期)认为,大示指以庙号区别字是“大”的神主为主体的集合庙主,与“七大示”同义。于成龙《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殷都学刊》4期)辨析了二者的源流关系及异同。相关研究可参刘一曼《论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辞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杜勇《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兼论巴非姬姓》(《殷都学刊》3期)、喻遂生《甲骨文历日释读校正五则》(《徐集》)、王建军《花东子卜辞所见改祭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原文物》2期)、刘风华《小屯南地甲骨残字补释廿例》(《徐集》)、任会斌《以清华所藏一坑甲骨为例浅谈卜骨的骨面施凿现象》(《徐集》)等。

甲骨缀合方面有:蔡哲茂《甲骨新缀九则》(《徐集》)、《新缀甲骨二十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王蕴智、张怡《殷墟出组卜王辞的考察及缀合》(《出土文献》第一辑)、蒋玉斌《〈甲骨文合集〉新缀十二组》、门艺《黄组龟腹甲新缀七组》、林宏明《利用缀合更正卜辞释文举例》(均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刘影《甲骨新缀四则》(《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莫伯峰《北师大所藏甲骨新缀五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七辑,商务印书馆)。

青铜器。张昌平等《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考古》8期)

探讨了商代范型技术的提升对青铜器形制、功能、艺术效果的影响。常怀颖《二里岗铜容器的“一带双纹”现象》(《文物》6期)认为,二里岗时期铜容器“一带双纹”的现象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和审美风格在形成之初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铜容器器形的变化和对纹饰表现与规范性的注重,这种现象便逐渐消失。余玲珠等《从出土实物和模拟实验看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的发展脉络》(《南方文物》4期)指出,商早期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已具成熟的工艺设计思想,在素范面压塑纹饰的“纹饰压塑技术”出现;商中期青铜器纹饰技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纹饰堆塑技术”,且与“纹饰压塑技术”并用;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技术达到顶峰。西周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无明显进步,纹饰制作技术显示退化趋势;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范铸工艺分型增多,纹饰技术发生改革,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

彭适凡《开展对中国南方古代青铜器研究的若干思考》(《南方文物》1期)指出,基于南方地区青铜器的复杂情况,应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拓展,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系统探索。张爱冰、陆勤毅《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年代与性质》(《考古》6期)指出,皖南所出7件青铜容器的年代大体在二里岗后期至西周初,多体现中原二里岗文化和殷墟的器物特征,由此可知商文明在皖南的存在和影响是持续的。马军霞《略论商周时期青铜卣的起源问题——以罐形卣为例》(《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青铜卣是从贯耳陶壶演变而来。张文立《青海出土直内卷角铜钺的年代及其他》(《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认为,这件铜钺并非实用器,年代约为卡约文化时期,是在当地铸造的,但受外来因素影响,显示出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此外,还有方辉《论我国早期国家阶段青铜礼器系统的形成》(《文史哲》1期),刘桓《商周金文族徽“天毚”新释》(《历史研究》1期),徐坚《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考古与文物》4期),严志斌《商代铭文青铜斝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向桃初《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考古与文物》2期),葛亮《谈谈“小子簋”铭的真伪及相关问题》(《文博》4期),马永强《商周时期车子衡末饰研究》(《考古》12期),韩金秋、杨建华《略论商周时期兵器上的乳钉纹》(《文物春秋》5期),马强《商周象纹青铜器初探》(《中原文物》5期)等。

夏商考古。张敏《殷商时期的长江下游》(《南京博物院集刊11——南京博物院建院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通过分析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的源流、文化特征及族属、分期等问题,认为长江下游基本不在商王朝控制之下,仅在二里岗时期受到影响。郜向平《商墓中的毁器习俗与明器化现象》(《考古与文物》1期)指出,商墓的毁器习俗盛于二里岗时期,在洹北花园庄时期数量显著减少,明器化的现象迅速兴起正好在毁器习俗走向衰败之时,属于“死生有别”的观念支配下随葬品处理方式的变化。此外,还有蒋刚《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考古学报》4期)、方辉《墓葬所见岳石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关系举例》(《中国历史文物》4期)、郑杰祥《郑州商城社祭遗址新探》(《中原文物》5期)、范毓周《关于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4期)、徐基《豫东与鲁西商文化遗存的启示》(《中国历史文物》4期)、谢肃《商文化手工业作坊内的祭祀(或巫术)遗存》(《江汉考古》1期)、燕生东《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结构研究——兼论制盐业的生产组织》(《古代文明》第8卷,文物出版社)、唐锦琼《殷墟花园庄东地M60的葬俗及其性质》(《考古》3期)等。

两周史

史事与制度。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4期)将师盂钟等器铭中的世系和师夷钟等的世系并列比较,推断姜太公确有两子世为太师,留侍王室,同周公、召公家族情形相似。刘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出土文献》第一辑)认为清华简《金縢》证实了周公居东就是“东征”的说法,并对宋儒和清儒在此问题上的纠结作了评议。李大鸣《周代齐国海盐业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从盐业在齐国早期兴起的角度赞同营丘在昌乐说,并考察了伴随着齐国拓展领土过程中的海盐业因素。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一辑)对黎国的铜器铭文及所见世系作了探讨,确证周代黎国为毕公之后。黄凤春《郾县辽瓦店子与楚句亶王——楚熊渠分封三王地理的检讨之一》(《江汉考古》2期)认为,郾县的辽瓦店子遗址当为熊渠之世句亶王的封地。相关研究还有张懋镠《金文所见商周之际诸兄地位的变迁——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黄盛璋《周初卜甲戡死霸重要价值,时代、用法、来源争论,祛疑解难》(《徐集》)、张闻玉《〈鲁世家〉与西周王年》(《徐集》)、刘光胜《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5期)、徐刚《先秦儒家经典所见礼制之原则研究——礼制研究的一种思路》(《燕京学报》新二十九期,北京大学出版社)、罗新慧《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张天恩《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文物》6期)。

魏克彬《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文物》10期)认为,“岳公”应是晋国崇拜的一个山神,山的名字叫“岳”,而“公”表示这位神在晋国自然神的制度中的位置。李天虹《竹书〈郑子家丧〉所涉历史事件综析》(《出土文献》第一辑)认为,《郑子家丧》可能是在楚国流传的有关晋楚两棠之战的一个版本,东周时期不以礼葬也许是对戴罪卿大夫的惩罚措施之一。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琊事析义》(《文史》第1辑)指出,越灭吴后割地予楚、宋和鲁,是缘于当时国内疲敝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政治策略;勾践徙都琅琊与齐国东南疆界并不冲突,迁移的路线则以顾颉刚的渡海说为是。罗运环《楚国谥法研究》(《徐集》)认为,楚国谥法起源于西周中叶,使用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敖谥制”。春秋早期楚称王后,引入周礼谥法,施行“王谥制”,这虽晚于中原列国,但在周代最早采用双字谥。陈絜《谈谈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的“丘”》(《徐集》)认为,葛陵楚简中的“某丘”是具体的村落名,系农村基层聚落“邑”的一部分。平夜君封域内并无里、邑之外的第三种基层行政组织存在。周书灿《战国时期楚国置郡问题三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3期)质疑了战国时期楚国灭越置江东郡、楚子灭巴置巴郡的说法。认为楚、秦黔中郡郡治当为一地,秦黔中郡辖境较楚黔中郡略大。刘芮方《秦庶长考》(《古代文明》3期)考察了庶长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职官体系中的变迁,认为其间反映出秦宗室力量的变化、秦官制的完善和君权的加强。杜勇《莒国亡年辨》(《管子学刊》3期)为《史记》莒灭于楚简王元年说做了补证。

此外,可参李家浩《楚简所记楚人祖先“鬻熊”与“穴熊”为一人说——兼说上古音幽部与微、文二部音转》(《文史》第3辑),马卫东《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山西大

同大学学报》1期),刘欣、谢乃和《略析春秋时期邦交中的吊丧礼》(《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任慧峰《先秦致师礼考论》、史志龙《楚简中的社祭礼仪》(均载《人文论丛·2009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华《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文史哲》6期),杨权喜《夔国文化及早期楚民族文化的再讨论》(《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七辑,岳麓书社),李均明《战国数字》(《出土文献》第一辑),董珊《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考古学报》2期),朱红林《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立法研究——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六)》(《古代文明》4期),张金光《战国秦时期“邑”的社会政治经济实体性——官社国野体制新说》(《史学月刊》11期),田炜《战国古玺所见官名研究三则》(《中山大学学报》5期),王志《史迁刘向所记屈原事及屈原自疏齐国考》(《北大史学》15,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青铜器。李学勤《论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东岳论丛》10期)认为,“甲”是“齐公”的日名,同理燕国铜器的“召伯父辛”也是指一个人。由此可证明,西周初期吴、齐、燕等封国与周王室一样保留了日名,直到西周早期后段才逐渐完成了由日名过渡到谥法。他的《何簋与何尊的关系》(《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从器主的身份与职掌论证两器同属一人,并对铭文中的“夷殷”作了探讨。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王占奎《读金随札——内史亳同》(均载《考古与文物》2期)均结合《书·顾命》对自名为“同”的新出西周早期青铜觚作了探讨。王清雷《长安马王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文物》9期)认为,马王村编钟不仅突破了西周编钟禁用商声的“武王之志”,还可以在同宫和不同宫系统的旋宫转调,显示了音乐史上的独特价值。何景成《论师酉盘铭文中的“弁狐”族》(《中国历史文物》5期)认为,师酉盘、师酉簋铭文中原释为“身”的字应改释为“瓜”,读为“狐”。作为地名的“弁狐”可能当读为“番吾”,地在今河北平山县一带,“弁狐夷”指居住于“番吾”一带的夷族,或可省称为“弁狐”。

相关研究还有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1期),裘锡圭《复公仲簋盖铭补释——兼说琯生器铭“寢氏”》(《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家浩《读金文札记两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蒋玉斌《令方尊、令方彝所谓“金小牛”再考》(《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三辑,大象出版社),张天恩《论毕伯鼎铭文的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08》,文物出版社),冯时《天亡簋铭文补论》(《出土文献》第一辑),陈青荣《从传世山东藏家的藏品看高青出土的青铜器》(《管子学刊》2期),孙敬明《陈庄金文卜辞小笺》(《中国文物报》4月2日),任相宏、张光明《高青陈庄遗址M18出土豊簋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探讨》(《管子学刊》2期),朱凤瀚《射壶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白于蓝《师永孟新释》(《考古与文物》5期),常怀颖《西周钟铸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张爱冰、陆勤毅《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2期),张懋镠、王勇《遣伯盨铭考释》(《出土文献》第一辑),李建西《西周金文“白金”初探》(《考古与文物》4期),韦心滢《季姬方尊再探》(《中原文物》3期),刘华夏《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期)等。

春秋时期金文的研究呈现出繁盛的势头。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文博》2期)指出,“吕王”是卢戎之王,而非姜姓之吕,故仍符合异姓边远之国称王说。李学勤《楚国申氏两簋读释》(《江汉考古》2期)指出,簋铭器主实系楚文王后裔申氏,叔姜则为申氏之妇,据此可否定申曾称王,且当时已复国的论点。李家浩《关于姑冯句鑊的作者是谁的问题》(《传统

中国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句鑕铭文中“昏同”即见于文献的越王勾践的大夫舌庸,器主“姑冯”为其子,这与春秋时期铜器铭文所记作器者自述身世的文例相合。李家浩《章子国戈小考》(《出土文献》第一辑)认为,戈铭“尾”系“屮”之省形,读为选;器主为楚人。彭裕商《再论嘉鼎的年代》(《徐集》)从形制、纹饰的比对推定嘉鼎(哀成叔鼎)年代应在春秋晚期末或春战之际,铭文中的康公未必是刘康公,可能只是不见经传的一般周室大夫。刘钊《齐国文字“主”字补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三辑)通过齐国器铭“主”字的例证,指出齐器有“唯主某年/某月”的独特即时方式。黄国辉《略论“姬鳧母温鼎”中的人物关系及婚姻制度》(《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姬鳧母是其姊配媵,鼎是她用来祭祀亡夫(铭文中的“公”)与亡姊的。邹英都《“楚王畬恂”考》(《徐集》)从器物形制、组合特征、铭文风格等方面对崇源拍卖公司征集的29件楚式青铜器作了考察,认为铭文中的“畬恂”是楚悼王熊疑。

李家浩《谈战国官印中的“旗”》(《徐集》)认为,“旗”读为“旅”,在官印中指有司之名。吴毅强《赵孟介壶新研》(《考古与文物》1期)从器形、纹饰分析壶属晋器,时代在春战之际。傅玥《试析望山M2遣策与青铜礼器的对应问题》(《江汉考古》1期)指出,望山M2出的46号简和47号简应缀合,简上所记器物在原发掘报告的表述中或有失误,“卯缶”同于尊缶,而“迅缶”同于浴缶或盥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中国金融出版社)收录有李学勤《长布、连布的文字和国别》、黄锡全《新见古文字材料与古代货币研究中之疑难问题举要》、吴良宝《续说“梁冢新”桥形布》三文,分别对战国楚、魏等国的货币文字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秦晓华《晋系货币地名试释三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对古币中汜、阳晋、郟三处地名作了考释。此外,可参刘信芳《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铸钟铭文初探》(《徐集》),陈阳、戴哲涛《中国财税博物馆藏滕侯跋之歌钟考》(《东方博物》3期),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七辑),李鲁滕《也谈“郟 姑鬲”》(《海岱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王辉《珍秦斋藏元年相邦疾戈跋》(《徐集》),董珊《释楚文字中的“汴 郟”与“胸忍”》(《出土文献》第一辑),吴良宝《谈韩兵监造者“司寇”的出现时间》、黄锡全《介绍两枚楚官玺》、萧毅《楚玺考释二则》、陈伟《车舆名试说(二则)》(上述四文均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

铭文研究以外,非中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研究也有了较多的成果,高西省《论梁带村新发现春秋时期青铜鍍形器》(《中国历史文物》6期)认为,梁带村M26出土的所谓弄器铜匜,实为带流鍍形器,兼具周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特色。朱华东《安徽铜陵出土青铜人面牌与雕题习俗》(《中国历史文物》2期)以这件春秋时期铜人面牌印证文献所记的雕题习俗,并讨论其族属、功用及宗教内蕴。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3期)指出,过去被视为北方标志物的动物纹样牌饰,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原定居民族生产制造的,并且采用了传统的泥范工艺,制作者有明显的官方背景。陈畅《岱海地区战国对称图案牌饰研究》(《华夏考古》4期)认为,岱海地区墓葬常见的S形龙纹牌饰、S形和方形凤纹牌饰可溯源到西周时期中原文化的玉石牌饰,同时也具有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玉石牌饰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原文化玉石牌饰在岱海地区金属化的结果。毕经纬《山东东周鼎簋制度初论——以中原地区为参照》(《管子学刊》3期)辨析了山东地区与中原地区在鼎簋制度上存在的差异。相关研究还有冯伟《皖南出土青铜句鑕的类型和年代分析》(《东方博物》3期)、王先福《襄樊余岗墓地楚式青铜礼器分期研究》(《江汉考古》3期)、牛长立《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的功用及特征》(《内蒙古

社会科学》汉文版6期)、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乐器坑所出铜虎性质刍议》(《丝绸之路》2期)、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文物》8期)等。

简帛、文献与思想史。宋镇豪《谈谈〈连山〉和〈归藏〉》(《文物》2期)认为,二书渊源有自,在甲骨文筮占材料和简牍中可寻见踪迹。张利军《〈尚书·高宗彤日〉的史料源流考察——兼论商人的灾异观》(《古代文明》4期)认为,《高宗彤日》所载之事在商代有其史料来源。上博简《竞建内之》是《高宗彤日》文本内容的流变。文中还探讨了商人灾异观及应对灾异的救助方法。姚智辉、范云峰《〈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二病”新探》(《中原文物》2期)认为,此句指戈的两种主要功能——啄击和勾斫对于形制的要求。许子滨《〈左传〉“经皇”释义——从高本汉〈左传注释〉谈起》(《九州学林》2010春夏季,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经皇”仍以杜预“门前阙”的注解最可信,这与《吕氏春秋·安死》所记“阙庭”及考古发现可相互印证。此外,可参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6期)、张光裕《〈诗·小雅·楚茨〉“勿替引之”与金文“日引勿替”互证申说》(《中国经学》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启示(之一)——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之二)——文献析读、证据比较及文本演变》(《中国哲学史》2期)阐述了如何纠正固有的不可靠的推理方法和推理前提等问题,从而改进文献考据的方法。以简帛文献已经证明错误的考证实例为依据分析常见考证方法的失误,特别是指出一些常见的推理方法之理论前提的盲点。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5期)对清华简第一辑的内容与史料价值作了阐述。夏德安《早期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与文字学——读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恒先〉》(《人文论丛·2009年卷》)认为,可以将《恒先》分成“核心文”及其传文共两个层次来解读。董珊《楚简中从“大”声之字的读法》(《古代文明》第8卷)指出,楚遣策中的“𡗗”(𡗗)或“大”即典籍的“害”、“𡗗”或“𡗗”,指车害;卜筮祭祷简的“𡗗”或“𡗗”均应从“大”声读为“厉”,“大”应是作祟的厉鬼。陈剑《试说战国文字中写法特殊的亢和从亢诸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三辑)指出,“𡗗”即六国文字中特殊写法的“亢”字,并以相关辞例作了验证。李天虹《简本〈晏子春秋〉与今本文本关系试探》(《中国史研究》3期)讨论了简本各章与今本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范常喜《上博简〈容成氏〉和〈天子建州〉中“鹿”字合证》(《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指出二文中的鹿均应读为离。侯乃峰《上博藏竹书〈吴命〉“先王姑嫜大配”考辨》(《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大配”是周武王长女、陈国始祖母的大姬,“姑嫜”读为“姑嫜”,与女儿、姑娘同义。

相关研究还有李学勤《〈程寤〉、〈保训〉“日不足”等语的读释》(《清华大学学报》2期)、王辉《读清华楚简〈保训〉札记(四则)》(《出土文献》第一辑)、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初读》(《出土文献》第一辑)、李家浩《谈包山楚简263号所记的席》(《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晁福林《试释战国竹简中的“薦”字并论周代的薦祭》(《中国史研究》2期)、刘国胜《包山二号楚墓遣册研究二则》(《考古》9期)、俞绍宏《葛陵简“癸還”考》(《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季旭昇《从经学及文字学谈谈上博楚简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载权仁寒等编《东亚资料学的可能性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范丽梅《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与〈子羔〉篇性质小议》(《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七辑)、孙飞燕《读〈容成氏〉札记》(《出土

文献》第一辑)、曹锦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楚辞〉》(《文物》2期)等。

杨华《上古中国的四方神崇拜和方位巫术》(《楚地简帛思想研究》四,崇文书局)指出,简帛材料显示战国时期楚人的四方神观念已和中原诸国无异,四方神虽已归于地祇,但还保留有天神的痕迹。刘焯《从秦楚〈日书〉看冠礼的择日问题》(《楚地简帛思想研究》四)认为,出土的《日书》材料也验证了冠礼设有在常月举行的规律,其中所记冠礼吉日与宜忌等,均与儒家礼书存在矛盾之处。许兆昌《从仲弓四问看战国早期儒家的政治关注》(《史学月刊》9期)通过上博简《仲弓》的考察,认为其反映出战国早期儒家臣道思想的多元特征。相关研究还有杨华《楚地山神研究》(《史林》5期)、黄海烈《荀子“法王说”及其对战国诸子的攻驳》(《齐鲁学刊》4期)等。

两周考古。马赛《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群构成情况研究——以墓葬材料为中心》(《古代文明》第8卷)认为,根据墓葬特征和随葬品使用方式等层面的差异,可以辨析出周原遗址的周人与殷遗民两个系统。高崇文《楚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8卷)通过对楚墓的分期和分类研究,论述了楚国的丧葬礼俗,进而探讨楚系青铜文化与汉淮间诸国文化的融合以及和吴越、巴蜀、百越系青铜文化的交流。何晓琳《双联钻卜甲卜骨与春秋早期楚文化面貌问题》(《江汉考古》3期)指出,双联钻卜甲卜骨是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楚人使用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遗物,使用时间不长,对于判定春秋早期楚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朱继平《考古所见楚对鄂东铜矿的争夺与控制》(《中国历史文物》6期)考察了两周时期楚人对鄂东铜矿的争夺与控制所经历的由弱到强、由间接到直接的复杂发展过程。张闻捷《试论楚墓的用鼎制度》(《江汉考古》4期)认为,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普遍出现的两套正鼎并非是人器和鬼器,而应分别属于祭器和食器两类。祭器一组仿效周制却并不彻底,而食器一组则沿用自身的偶鼎制度。二者的区分主要通过纽的形制来实现。梁云《非子封邑的考古学探索》(《中国历史文物》3期)推断清水县李崖遗址为非子封邑之所在。牛头河流域属寺洼文化势力薄弱区,可能与商、周王朝的大力经营有关。徐少华《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两座墓葬年代析论》(《文物》8期)指出双墩一号墓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560年前后,即春秋晚期前段,凤阳卞庄一号墓略晚于前者。张敏《吴越贵族墓葬的甄别研究》(《文物》1期)认为,自西周至战国早期吴越贵族墓葬可分两类:随葬青铜车马器的属吴,随葬陶瓷礼乐器和玉器是越墓。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的复原——兼谈族属问题》(《文物》6期)将马家塬墓地推定为西戎的绵诸戎首领墓地。范毓周《关于战国“玉行气铭杖首”的几个问题》(《徐集》)认为该器为修炼“行气”之术的人所使用的练功辅助工具杖的杖首,从铭文字体看应是战国中期楚人的遗物。曹菁菁《新发现石璋如未刊书稿》(《文津学志》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考述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石璋如20世纪40年代未刊稿《古墓发现与发掘》的成书缘由与学术史价值。

此外,可参高明《论石鼓文年代》(《考古学报》3期)、尹弘兵《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与江南铜矿》(《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七辑)、王方《东周时期“被发”的考古学解读》(《东南文化》5期)、石荣传《桐柏月河一号墓玉器与东周文化交流》(《东南文化》5期)、褚馨《战国S形龙佩的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赵善德、郭菁菁《东周时期东江流域文化遗存研究》(《暨南学报》5期)。